



# “死生一事付鸿毛”：论秋瑾的生死观及其当代价值

张丽华，郭诺明

**摘要：**大人意识是秋瑾生死观的基础与动力，拯救意识是价值选择与实现路径，超越意识是终极目的，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秋瑾生死之思的内核。大人意识具体展开为自作主宰的英雄主义意识与合群、爱群的集体主义意识。拯救意识则根植于当时的民族矛盾与男女不平等，“铁血主义”的激进的民族革命与“男女平权天赋就”女权运动是秋瑾人生观建构的实践路径，“天教红粉定神京”是秋瑾对自我生命价值实践路径的期许。超越意识体现为对死亡的超越，是秋瑾人生观建构之终极目的，是大人意识展开的必然结果，也是彰显其拯救意识和救世行为的指南针，超越意识的出发点是构建“身后万世名”的精神生命，基本内涵是“只有英雄忠义辈，肉身虽死性灵存”的死而不朽，价值取向是舍生取义。探析秋瑾生死之思的真谛，对于当代建构科学的人生观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张俊贤

收稿日期：2024-12-12

接受日期：2025-06-29

发表日期：2025-11-16

通讯作者：郭诺明, Email:

56598223@qq.com

**关键词：**秋瑾，生死观，大人意识，拯救意识，超越意识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957-370X (2025) 02-0052-11

## 引言

人有生即有死，生死是人生的两面。死亡是每一种有生之物的必然结局，也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命运。一般来说，生存在于可感可知的经验界，死却存在于不可感知的超验界。故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谈论人生问题，其实谈的是如何生的问题。对于如何死的问题却关注不多，甚至颇多错误的认知。有人以为死亡是人从有到无的过程，其实质是让人一无所有，因此这些人将死亡视为能吞噬一切的黑洞，对死亡采取一种回避、漠视的态度，但死亡并不因此不降临。也有人认为死亡不仅是人生的一部分，更是“人类存在、成长及发展的一部分”，甚至于“生命的意义及成长的关键即在于死亡”。对此，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的存在”。正是在死亡的威胁下，才逼出了人的本真。因为人在死亡面前无所遁形、无法逃避、更无法作伪。人不仅要思考如何生的问题，也必须思考如何死的



问题。而对死亡的思想、抉择和实践就构成了所谓的生死观,生死观之建立又反过来指导、规定人如何活。换言之,人不是通过如何活来决定如何死,而是要以人如何死决定人如何活。如果一个人不思考死亡问题,那他的人生注定无法迸发出耀眼的光芒。面对人生之有限,唯有点亮生命的亮度、提升生命的高度、延长生命的长度,才能在死亡中获得成长。故此,人面对死亡,如何才能有尊严地去回应并由此获得对人生之觉解,这是生死学的核心课题,也是本文以秋瑾的个案来探析生死观的缘由所在。

秋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性之一。作为一名革命者,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解放、女性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去;作为一名诗人,她用诗歌痛斥当时的腐恶,热情地讴歌铁血主义,炽热地呼唤女性的觉醒,可以说,刚与柔、剑气与箫琴,侠骨与柔肠,在秋瑾的生命世界中构成了绚烂多彩的色调。她悲剧化的陨落,更是引发了人们无尽的悲惋,也引发了学界持续的关注,但对其生死观的专题研究却非常薄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秋瑾虽非经院式的哲学家,她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却有着深刻的洞见。作为一名革命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随时可能牺牲,也就迫使她不得不思考死亡的问题。正是对死亡问题思之熟、思之透,秋瑾才能迅速地成长起来,建构了一套英雄主义的人生观。通过对死亡的体知,又进一步提振了她对人生的理解,坚定了她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说,秋瑾正是一个这样认真思考,并认真准备如何死亡,并由此获得不朽生命的人。秋瑾慷慨壮烈的生命实践所引发的思考,在当下仍具有深切的意义和价值。

## 一、“大人处世当与神物游”的大人意识

生死观之基础在于对人的本质(我是谁)的界定。与其他物种不同的是,人是意义动物。赋予自我以意义与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即人只有通过对自己本质的界定,才能决定如何展开人生。秋瑾对于决定自我的本质的界定是“大人”,秋瑾又称之为“英雌”。通过对自我本质的这种界定,才能确立秋瑾人生之基本进路以及实现生死超越的路向。

### (一) 大人处世当与神物游

大人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英雄主义。在秋瑾的诗文中,这种大人意识或者说英雄主义反复出现,可以说是其生命意识的核心。在《泛东海歌》<sup>[1]84· [2]70</sup>中,秋瑾以一种激昂、雄奇、浪漫的笔调写出了一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与造物者同游的大人形象,她“骑白龙”“跨猛虎”,“与神物游”<sup>[1]84</sup>,而视碌碌尘寰者“安足伍”<sup>[1]84</sup>。秋瑾此诗,与陆九渊的《大人诗》在取象上有某种内在的契合。不同的是,陆九渊所谓的大人是儒家的圣人,而秋瑾笔下的大人实际上却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者。生活在清末的秋瑾,之所以能迸发出这种慷慨激昂的情怀与深沉的生命意识,从而冲决时人异样的目光和无形的桎梏,成就其大人的人格,既有她长期在湖南生活养成的火辣与不服输,也有因其自



身婚姻生活的际遇而产生的“移情”;既有西学东渐后的文化熏染,更是她对时代命运与自我责任的深刻体知。<sup>[3]</sup>

众所周知,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周旋中是不断颓败的。在这种颓败中,国家颓丧,人心涣散,外敌环伺,内政腐败,值此之境,“中华偌大竟无人”<sup>[1]94</sup>。平心而论,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也是试图通过不断的变革去应对时局,但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精英如李鸿章也只能用“糊纸匠”来形容自己的无力与尴尬。可以说,清末落后的治理能力与内外交困的现实让这个老大帝国摇摇欲坠,旧的方法已然行不通,新的方法尚不情愿学,内部矛盾无法消弭,外部困境难以化解,被甩入世界丛林的时人茫然无措,不知所以,这就是秋瑾所谓的“没个英雄作主”的时代。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才让秋瑾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逐渐形成自作主宰的英雄主义。

秋瑾所反复讲的“独立”“自立”就是自作主宰的英雄主义的具体表征。正是“没个英雄做主”,所以秋瑾自作主宰,这也是秋瑾不断追求民族独立,积极投身妇女解放事业的内在精神之源。她认为,此种独立的、自作主宰的精神“似火燃”,就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这些星星之火种,就深植在具有“儿女情、慈悲志”的能够为民族之独立与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的心中,他们力挽狂澜、中流击楫,只思“拯斯民于衽席,奠国运如磐石”<sup>[1]19</sup>。秋瑾她自己也颇以这样的“大英雄”自许,并冀望“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sup>[1]13</sup>。正是这种先驱精神,让秋瑾的大人意识在时代的呼唤中进一步的升华和凝结,从而为其英雄主义人生观之形成以及人生之实践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 (二) 非合群不可

秋瑾不仅对自我有着很高的期许,也希望当时中国的四万万同胞,特别是二万万女同胞能觉醒和振奋。她曾声情并茂地写道:“处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气,当不甘为彼人之奴隶也。”<sup>[1]41</sup>因此,秋瑾真挚地希望二万万的妇女同胞能走出幽深的闺房,穿上轻便的服装,迈出小家,融入大家,走入学校,走向社会。从而培养独立之人格、习得专门之才能,“做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其速继罗兰、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如安而兴起焉”<sup>[1]22</sup>,最终成为“庄严国民之母”,为“家庭教育之改良,社会精神之演进”之事业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妇女要进入社会,融入社会,要想自立,首先要做到“合群”。对此,秋瑾认为:“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sup>[1]32</sup>不仅女子非“合群”不可,男子又岂能外之。故而,秋瑾认为:“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sup>[1]21</sup>自爱、爱生、爱群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族群、社会、国家应尽的责任。如果自己所在的种族、国家不保,那么作为个体就必然会如飘摇之草木,陷入悲惨之命运而无法自拔。爱群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体现,即能否促进其族群之生存与发展。因此,所谓的“合群”意识一方面是秋瑾自主主宰的人生观在社会中的落实,同时,“爱生”“爱群”的



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又导致其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倾向于走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

如果说自作主宰的英雄主义是秋瑾大人意识的理想面, 那么“合群”的集体主义就是秋瑾大人意识的现实面, 二者共同构成了秋瑾人生观的底色。理想面偏主观, 现实面偏客观。如果仅考察其主观面, 则容易误认为秋瑾是一个唯意志论者。若进一步考察秋瑾的大人精神的客观面, 则其倡女权、倡铁血主义, 特别是她身体力行, 在浙江绍兴的大通学堂训练革命同志, 准备革命暴动等, 无不是脚踏实地之社会实践的具体表现。

## 二、“天教红粉定神京”的拯救意识

拯救意识作为大人意识的延伸, 是秋瑾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然抉择, 是秋瑾人生价值展现之具体实践路径, 其目的是要解决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秋瑾既以“先驱”“先导”的“大人”自命, 则其当时的形势之下, 迸发出拯救斯民于水火、解救万民于倒悬的拯救意识便成为了一种必然。秋瑾基于对自我本质的设定以及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认知, 建构了将人生与政治高度凝结的人生观, 质而言之, 秋瑾的人生观存在着人生政治化的倾向。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 秋瑾的拯救意识就是对于自己的族类所受的苦难与屈辱的抗争;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秋瑾的拯救意识集中于对男女平权的高度渴望和自觉追求。秋瑾认为, 当时的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不公不义, 主要体现为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与男女不平等的矛盾。虽然秋瑾也意识到了欧风美雨的激荡, 即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 但显然只是偶然提及, 并未视为主要的矛盾予以审视, 这也是当时的时代和思想观念所决定的。

### (一) 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

在清末沉重的社会危机面前, 可谓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在种种的矛盾之中, 包括秋瑾在内的很多革命者将所有矛盾的矛头指向了清政府的统治, 即认为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首先要以民族革命的形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之后方有可能。对此, 秋瑾认为, 在清末“欧风美雨, 咄咄逼人”<sup>[1]21</sup>“满贼汉奸, 网罗交至”<sup>[1]20</sup>的现实之下, 清政府一方面对革命者残酷镇压, 一方面也预备实行所谓的“立宪”。不过, 在许多革命者看来, 所谓的“立宪”, 不过是以立宪之名, 行专制之实, 也不过是“制我汉族之死命”<sup>[1]20</sup>而已。在秋瑾等革命者看来, 此时的清政府已然失去了政权的合法性。因而, 秋瑾发出了“今日之时势, 有不容不革命者乎”<sup>[1]20</sup>的呐喊。此时革命已经被秋瑾等革命者看作是当时必然的抉择, 故在秋瑾的诗词中, “刀”“剑”是非常核心的意象, 以“刀”“剑”之锋利, 寓意革命之决绝与行动之力量。秋瑾面对腥风血雨弥漫的现实情境, 认为只有用“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 才能够“斩尽妖魔”, 打破黑暗, 重见光明。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 才能达到“澄清天下”的目的。至于其代价如何, 则“成败利钝不计较”。在秋瑾这样的革命者看来, “铁血主义”或称“赤铁主义”是其生命政治展现的场域, 是其拯救祖国于危难最重要的手段和方式。



## (二) 男女平权天赋就

民族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族之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而男女平权的目的则在于解放女性, 实现男女平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由来已久。秋瑾认为: “上天生人, 男女原没有分别。”<sup>[1]5</sup> 也就是说, 男女本来没有分别, 此亦人也, 彼亦人也。如果说有分别的话, 男女的不同不过是性别与社会分工的不同, 其本质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在人类的世界中, 不存在单性别的社会。因此, 男女是相互依存的, 双方都是以对方不可或缺的存在为前提。但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 却出现了以男权抑制女权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及以“三纲”为核心的制度安排, 从而将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现实境遇。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大多数女性也被潜移默化地趋向于认同这一观念。正是在女性的自我否定中, 女性被拘束在狭隘的生活世界中。秋瑾认为, 正是由于当时的女性只知依傍男子, 缺乏自觉自立自主的意识, 甚至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从而将富贵贫贱的际遇转化为命好不好问题。命好则安享尊荣, “奴仆成群”“前呼后拥”<sup>[1]4</sup>; 命不好则气闷闷地受着, 眼泪常常滴着, 生活是巴巴结结地过着。一句话, 就是不知自立、自强、自尊为何物, 也不知即便是这些所谓的命好的女同胞, 不过是被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束缚的紧紧的”<sup>[1]4</sup>, 可谓是“一世的囚徒”<sup>[1]4</sup>, 故秋瑾认为广大的女同胞仍然“沉沦在十八层地狱, 一层也不想爬上来”<sup>[1]4</sup>, 甚至有很多的女性也把这种“一世的囚徒, 半生的牛马”的生涯视为理所应当。对此, 秋瑾希望女子要摆脱思想观念的禁锢, 挣脱“奴隶的名儿”, 洗涤认命的心态, 首先要有志气。唯有志气, 方能自信自立。自信自己能“学得科学工艺, 做教习, 开工厂”<sup>[1]5</sup>, 能够“智识学问历练就”, 从而实现“自己养活自己”, 由此自立, 摆脱依附和坐食。秋瑾不仅在精神上鼓励女性, 还循循善诱地列举了女子自立的诸多益处, 如“可使家业兴隆”, “可使男子敬重”, “或受高等的名誉, 或为伟大的功业, 中外称扬, 通国敬慕”<sup>[1]5</sup>, 等等。

秋瑾积极宣扬女权, 认为“男女平权天赋就”, 即男女之间权利平等是天赋的, 但有时秋瑾又对这种“天赋”的“男女平权”表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秋瑾一方面以古代的花木兰、秦良玉等古代女杰为榜样, 认为“人类之中, 女子最慧”<sup>[1]22</sup>, “女英女杰知多少, 男子犹且不及焉”<sup>[1]55</sup>, 即女子不仅不是不如男子, 不少女子更是比一般的男儿更可能的杰出者, 甚至于迸发出“天教红粉定神京”的呼声, 即女子也同样有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使命; 另一方面, 秋瑾又不自觉地显现出“男性化”的倾向, 如秋瑾改易男装, “俨然须眉”。又如其《满江红》中的“身不得, 男儿列”<sup>[1]01</sup>, 所谓“身不得”, 正是其所欲得。对此, 邹勇认为, 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与思想资源无法给秋瑾以更多的参照, “导致秋瑾认知上的贫血, 让她认定男女想要平权, 是需要通过模拟男性来完成的”<sup>[4]26</sup>。概而言之, 秋瑾通过易装、革命等手段不仅“摆脱了传统女性角色的束缚, 更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蜕变”<sup>[5]73</sup>。

通过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和提倡女权, 秋瑾找到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具体的路径, 使其不再是“三年造反不成”的“秀才”, 而是积极奔走、努力践行革命思想的革命者。虽然, 秋瑾“出师未捷身先



死”, 但其精神已经突破了时空, 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

### 三、“死生一事付鸿毛”的超越意识

超越意识是大人意识展开的必然结果, 也是彰显其拯救意识和救世行为的指南针。超越意识是秋瑾生死观最重要的向度, 它需要追问如何实践其生死观, 如何跨越人生之有限而臻于无限, 甚至于思考如何在生死体验中获得生命的升华。作为一个英雄, 秋瑾应该有这样的追问: 我与其他的女性, 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又如何去展开其所欲拯救的世界呢? 更重要的是, 我终极目的是什么? 这些追问反映在人生观、特别是生死观中, 就必然会思考生死的意义是什么? 应该如何去面对、接受死亡, 甚至会思考如何在死亡中实现生命的超越性意义等。

#### (一) 所经意者, 身后万世名耳

死亡, 在大多数人看来, 是极力要避免和逃避的。因为在他们看来, 死亡就意味着丧失一切, 所有的物质财富都会易主, 感官欲望、心理之活动都通通会消失。故而, 这些人将死亡视之为“黑洞”, 终身试图挣脱这个“黑洞”, 却无人能够真正的挣脱。不过, 也有人认为, 既然死亡既然无法避免, 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充分实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以达到超越死亡的终极目的。而要超越生死, 必有一建构过程。这一建构过程, 用秋瑾的话来说, 就是“所经意者, 身后万世名耳”<sup>[1]39</sup>。由此可见, 秋瑾所试图建构的不是一时之功业, 而是如何实现不朽。

秋瑾之所以能以英雄自许, 以建不朽之功业为己任, 首先应归因于秋瑾的婚姻悲剧使得其在家庭中无法实现其价值。在自由、平等观念的熏染下, 她将其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由狭小的家庭转向了广阔的社会。试想, 如果秋瑾家庭和美、琴瑟和谐, 她应当是一名优秀的文学家, 而未必会成长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秋瑾在给其兄长秋誉章的信中写道: “使得一佳弟子而事, 岂随(遂)不能稍有施展, 以光母族乎?”<sup>[1]38</sup> 于此可见, 家庭婚姻的不幸对秋瑾的影响非常大, 秋瑾则用“水激石则鸣, 人激志则宏”<sup>[1]38</sup> 来表明这种影响。其次, 秋瑾在接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等理念之后, 迸发出对这种价值积极追求的意欲。秋瑾正是在“曙光新放文明后, 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 智识学问历练就”<sup>[1]117</sup> 后“责任上肩头”<sup>[1]117</sup>, 并以“中国苏菲亚”<sup>[6]25-31· [7]34-37</sup> 自励, 着力于唤醒广大的民众, 唤醒广大的女性, 激发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试图扭转乾坤, 以实现“恢复江山劳素手”<sup>[1]117</sup> 的宏愿。最后, 人生是求一时之功业, 还是求不朽之盛事, 这是一道关于价值观的选择题, 中间并无苟且的余地。秋瑾既然选择成就不朽之盛事, 在家与国、身与义中必然有其取舍。

#### (二) 为国牺牲敢惜身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就必然面临着流血牺牲。死亡对于革命者而言, 不是遥远的空洞的语词, 而是切切实实会发生的, 是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秋瑾认为, 革命者中也有真伪之分, 一种是



真革命者,一种是投机者,后者只是将革命当作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秋瑾认为后者会在利益的引诱下,会轻易地丢弃革命理想,因为这些人“无非是为自私自利起见”<sup>[1]163</sup>,若清政府能以利益、赏以官职,诱以富贵,这些人便“将排胡耶、革命耶这些话,丢到爪哇国去了”<sup>[1]163</sup>;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为了“报祖宗的仇,光复祖宗的土地,为自己的汉人造幸福”而努力奋斗,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得“虚名誉”,而是为了整个族群谋幸福,故而他们在面对艰难困苦,甚至生死考验时,也不会放弃其信仰,唯有如此,才能够做到“不惧生死”“不畏艰难”,才能说是“真革命家”。秋瑾以革命为己任,在徐锡麟遇害后,有人劝其避难,离开绍兴。但秋瑾不为所动,继续按部就班准备起义相关事宜,最终被害。在此,笔者试图从更长的心路历程来考察秋瑾的革命献身精神。

首先,就革命的献身精神的心理准备而言,秋瑾早就有所思考。秋瑾认为,为革命而死,是一种光荣。而这种光荣,却尽为男子所占,实在是女界的一种耻辱。秋瑾认为革命是全体同胞之事,没有男女之别,而应一体尽责,共同努力奋斗。于此可见,秋瑾对于自己的死亡,特别是作为女性革命者为革命而死,有着清晰的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死亡具有了宗教性的超越意义。

其次,秋瑾清晰地界定了如何实现不朽。她认为:“只有英雄忠义辈,肉身虽死性灵存。姓名遍布人钦慕,功业巍巍救我民。卫国卫民留正气,这般人物万年尊。”<sup>[1]130</sup>人生无论长短,总归是要死亡的。但死亡之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意义却是不同的。有些人虽生犹死,有些人虽死犹生。虽死犹生,就是《道德经》中所说的“死而不亡”。人一定会消亡的是其肉体,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肉体的成住坏灭是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但精神生命则有所不同,它作为一种实存而易为人所忽视的生命形态,它就如光明一样可以冲破黑暗,只要生命之光辉达到一定的程度,便可突破时空之限囿,以至于不朽。在秋瑾看来,这些“英雄忠义辈”,肉身虽死,但“性灵”永存,故而“这般人物万年尊”。

最后,就秋瑾的生死实践来说,充分践行了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秋瑾被捕后,受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坚不吐供”,仅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尔后,引颈就戮,神色无异。由此可见,在秋瑾的头脑中,已经无数次地预演过自己的死亡。真实的死亡,不过是无数次中的一次罢了。正因为其思之熟,故能在变故之中能从容应对,生死不惊,视死如归。

#### 四、秋瑾生死之思的当代价值

秋瑾正是一个这样认真思考,并认真准备如何死亡,并由此获得不朽生命的人。其慷慨壮烈的生命实践所引发的思考,在当下的人生观之建构与思想政治教育仍具有深切的意义和价值。透过秋瑾的生死之思,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 (一) 正确体认“我是谁”是建构科学的人生观的基础

“我是谁”,即有关人的本质的思考。古今中外,不同流派的思想家皆对此问题有过阐述,在这



其中,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无疑是最深刻的。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8]501</sup>。也就是说, 处于历史中的不同的社会实践水平所关联的复杂关系形成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关系, 从而也决定了不同的人的本质。现实中的人必然面对已然铺就了的无形的社会网络, 从而为人的实践提供前提, 同时也限定了人的实践场域, 因此这张无形之网先在地塑造了人生的底色, 但人面对这种既定, 不是纯然被动的, 人也可以在这张网络中不断地自我认知与重新塑造。

对于秋瑾而言, 时代的底色是她无法拣择的现实, 不过她并不因此而怨天尤人, 相反, 她以花木兰、秦良玉等古代女性豪杰为楷模, 以中国的“苏菲亚”自任, 积极吸纳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日本的武士精神以及西方的“平等”“自由”等价值, 认为“为人须为人中雄”<sup>[1]79</sup>, 在面对时代危局时, 她毅然决然地践行“闺人欲负戈”<sup>[1]77</sup>的抱负, 并在革命实践中与革命同志“相与挽颓波”<sup>[1]77</sup>, 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人生目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 建构了秋瑾英雄主义的人生观。秋瑾以其慷慨壮烈的生命实践证成了其生死之思的价值与意义。

当然, 不同的时代, 人生观之建构有不同的主题, 但通过自觉体认“我是谁”, 是建构人生观之基础的通义。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应该像狼一样, 则其人生之实践必然以他人为地狱, 不择手段地攫取功名利禄。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不过是比狮子更凶狠、比鹰看得更远、比狼更狡诈的存在而已, 而人类世界也不免退化到丛林世界。因此, 正确地体认“我是谁”, 既要确立个体生命之边界, 充分尊重个体的发展, 同时也要意识到, 个体与群体是不可能分割的。个体唯有将小我与大我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小我走向大我, 从个我走向类我, 建构一种大我、类我的人生观, 并在这种建构中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这样, 个体的生命本质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 个体的生命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程度地彰显, 个体的生命才能突破有限, 臻于无限。

## (二) 自觉思考“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

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如何, 不仅取决于每个人对其自我本质的规定, 也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道路的抉择, 更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价值实现路径的致思和实践过程的致思。对自己本质的思考, 是对人的内在规定性的致思; 对“我该做什么”“我该如何做”的思考, 则是对人生价值实现路径的致思。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 同时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客观性和人的生命本质的外在性的评判标准。因此, 人生之建构过程, 必然体现为内在本质的体认与推进人生价值实践路径的结合。

对于秋瑾而言, 她面对“茫茫神州叹陆沉, 救时无计愧偷生”<sup>[1]81</sup>的艰难局面, 激发了她“苍天有意磨英骨”<sup>[1]84</sup>的豪气, 认为“英雄事业凭身造, 天职宁容袖手观”<sup>[1]87</sup>, 因此她“欲从大地拯危局”, 而其拯救危局的主要路径, 则是投身革命和倡导女权运动。而其路径的确定, 则是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 以解决时代问题为其人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是秋瑾生死之思的重要结论。秋瑾在时



代的困境中“奋然自拔”，为了实现其理想，不屈不挠，直至英勇就义。这一点是很值得珍视的。

在当下，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的微妙时期，一个人在此情境之下，能否自觉地将国家民族的命运、时代的主题内化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抉择与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之中，是新时期给每一个人的考卷。每一个中华儿女能否踏踏实实，踏石留印，抓铁留痕，自觉地筑牢人生之基，走稳人生之路，在这场人生的答卷中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一个人的贡献或有大小，但只要涓滴汇入江海，抔土积成高峰，则虽小而大；相反，必然流入歧途，则似大而小。

### （三）建构自觉的生死观有利于生命个体应对死亡问题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相反，死亡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的回应死亡呢？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生命是多维的。郑晓江先生认为，作为多维的生命综合体，首先包含生理性的物质生命、关系性的精神生命两个主要维度，而关系性的精神生命又包括血缘性的亲缘生命、人际性的社会生命以及超越性的精神生命等。<sup>[9]</sup>多维生命的实存构成了生命的实相，它也决定了人的生命意义建构与实践展开场域的丰富性。生命固然是多维的，从理论上也可以预设多维生命皆臻于极致的可能性，但就现实而言，一个人的生命实践不必然要求也不可能填满所有的生命维度。当秋瑾全身心地投身革命时，她的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消隐；当她面对屠刀时，她的肉体生命因此而殒没，但秋瑾的精神生命并不因此而烟消云散。因此，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该结合自身生命情境，选择适合自我生命展开的维度，这是一个人实现其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基本致思。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死亡只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如上所述，生命是多维的，但多维生命的地位和作用却有不同。肉体生命作为可感可知的存在，是人生的基本要素。但肉体生命的存续相对于死亡来说，却是短暂的，而精神生命既可以在肉体生命之中，也可以溢出肉体生命之外，从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肉体生命之终结，不过是人的生活的中止，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必然终结。所谓的死亡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生命维度的抉择问题。而如果意识到死亡不仅是人生的一部分，甚至于“生命的意义及成长的关键即在于死亡”<sup>[10]</sup>，则生死之抉择将因对生命意义理解之不同而有不同。对于秋瑾这样的革命者来说，就是舍生取义，还是求生忘义的问题。她清醒地意识到，肉体生命的死亡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件，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此时还是彼时而已，永存之“性灵”方是生命永恒性的基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轻掷肉身，这些革命者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不过是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不得不做出的抉择而已。对于当代的大多数人来说，都很在意经营生活，着意保存肉体，但对精神生命之培育却往往有所不足。肉体的温寒饥饱，显而易见；精神之饥渴意欲，却忽而无感。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只有将善生与善死结合起来，将肉体生命



之保养与精神生命之建构结合起来, 才能获得更高的人生品质。

最后, 死亡作为每个生命个体无法避免的事, 应通过以死观生的方法, 通过对死亡的致思建构人生超越的可能性。秋瑾通过自觉地思考如何实现“身后万世名”, 在这种思考中自觉地、坦诚地面对可能的死亡, 故在真正的死亡面前, 才能视死如归。当下的教育, 教育者及家长对如何生的部分讲得非常充分, 但对如何面对死则语焉不详, 甚至刻意回避。因而, 现实中就出现了对于死亡一事, 小时候不教、年轻时不想、老了乱想的现象。对此, 我们可以通过推动生死观的教育, 让人们更全面的体知死亡的真相, 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如此, 当死亡降临时, 人们就能顺受其正了。人最大的自由, 就是面对死亡的自由。秋瑾正是对死亡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觉解, 才能够从容就义。当然, 当下的时代与秋瑾不同, 但死亡并不意味着更容易应对, 关键的问题在于生命个体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 五、结语

秋瑾对时代的定位是“黑暗”, 对自我的定位是“英雄”(大人意识), “英雄”展现生命力量之场所在国家社会(合群意识), “英雄”之责任是拯救生民于水火(拯救意识), 其实现路径是发动“革命”和提倡“女权”。唯有如此, 才能实现其所“经意”的“身后万世名”(超越意识), 并实现生命的终极目的。就秋瑾的三大生命本原意识中, 大人意识是基础, 是动力; 拯救意识是行为, 是路径; 超越意识是终极目的, 三者共同构成秋瑾生死之思的内核。概而言之, 其生死之思透显出一种英雄主义的人生观。其生死观虽然有其时代性, 但总的来说, 我们可以含英咀华, 充分借鉴吸收秋瑾人生观、生死观的有益养分, 为当下人们建构科学的人生观、生死观提供积极的参考与借鉴。

## 参考文献

- [1]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秋瑾.秋瑾诗文集[M].郭长海,郭君兮,辑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70.
- [3]张弛.走出闺阁与性别想象——论居湘时期的秋瑾及其诗作[J].中国文学研究,2019(01):145-151.
- [4]邹勇.秋瑾之死——铁血英雄的留名情结[J].文教资料,2018(35):124-127+114.
- [5]黄华.始信英雄亦有雌——中日学者笔下的秋瑾装束[J].妇女研究论丛,2015(02):73-80+89.
- [6]符杰祥.“中国苏菲亚”是怎样炼成的——秋瑾与“西方美人”的文化政治[J].文艺争鸣,2016(07):25-31.
- [7]谢俊美.从自我形象设计探究秋瑾的梦想与追求[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03):34-37.
- [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9]郑晓江.论人类生命的二维性四重性——以自杀问题与人生意义问题为中心[J].广东社会科学,2010(05):51-56.



[10]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成长到最后阶段[M].孙振青, 编译.台北: 光启出版社, 1993: 9.

## 作者简介 (ID) :

1. 张丽华, 女, 硕士, 南昌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  
Email:254563040@qq.com

2. 郭诺明, 男, 博士,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儒家哲学、生死哲学,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学府大道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邮编: 330038。

Email:56598223@qq.com

## 基金项目:

项目名称: 江西省高校教改课题“数字化红色文化赋能《思想道德与法治》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项目编号: JXJG-24-10-11